

Reviews of the Domestic Regional Investment Environment of 21st Century*

Yanfu Zhu, Jianping Zhang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Email: zhuyanfu@126.com

Received: Jun. 28th, 2012; revised: Jul. 15th, 2012; accepted: Jul. 20th, 2012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existing literatures, the purpose of this review was to understand the scholars' opinions on regional investment environment throughout China.

Keywords: Investment Environment; Location Selection; OIL Model;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PCA);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21 世纪国内区域投资环境问题研究述评*

朱延福, 张建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武汉
Email: zhuyanfu@126.com

收稿日期: 2012 年 6 月 28 日; 修回日期: 2012 年 7 月 15 日; 录用日期: 2012 年 7 月 20 日

摘要: 本文对本世纪以来国内有关区域投资环境问题研究的学术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归纳、叙述和评论, 从中可以了解理论界对我国各地的区域投资环境的评价。

关键词: 投资环境; 区位选择; OIL 模型; 主成分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

1. 引言

自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特别是本世纪以来, 对投资环境的研究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热点, 其中对区域投资环境的研究又是最主要的内容。人们通过对不同区域投资环境的分析和比较, 试图从理论上对国内资本的区位流动特别是外商对华直接投资(FDI)的区位选择进行解释, 对凯夫斯(Caves)关于区域投资环境的交易费用模型和邓宁(Dunning)的折中模型(Ownership-Internalization-Local, OIL)进行实证检验, 为各级政府改善投资环境、创建具有区域特色的引资竞争力提供对策, 为国内外的投资商的区位选择提供指导。本文试图对本世纪以来国内关于区域投资环境

研究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归纳、叙述和评论。按照研究的对象划分, 一个国家的区域可以分为行政区、地缘区和开发区等三种类型, 下面分别予以述评。

2. 行政区投资环境研究

行政区是我国最重要的区域划分。我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 各级地方政府的权力都是来自于上级政府的授权, 而不是直接来自于本地区居民的让渡, 所以中国的行政区划最为权威、统一和明确, 其他形式的各种区划往往都是依附于行政区划的。我国的行政区可分为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地区、州)、县(市、旗)、乡(镇、街道)四级。其中, 省级行政区是我国的一级行政区, 也是在制订招商引资政策、优化投资环境工作中具有最大决策权的地方政府, 所以在

*资助信息: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对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问题研究》(编号: 98BJL041)的成果之一。

区域投资环境的研究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区域投资环境研究主要是围绕这一层次及其上下展开的,主要内容有:对全国 31 个一级行政区的投资环境进行总体研究;分省市进行个案研究;对省内的地市州比较研究;选择部分省市进行比较研究等。

2.1. 全国性的研究

1) 截面静态分析。张雅清^[1]根据 2004 年的统计资料,对全国 31 个省区的投资环境进行截面静态分析。发现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等 4 个指标影响重大,其评分结果是,综合得分最高的是广东,其他省区投资环境的等级与其所在的东、中、西三大经济带基本一致。

2) 时间序列动态分析。张钟学等^[2]用 1985~2007 年中国各省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动态分析。将我国投资环境的发展划分为一期(1985~1991)、二期(1992~1998)、三期(1999~2007),研究各省区投资环境的动态变化。从总体上看,北京、天津、江苏、浙江等东部沿海省市的得分大幅上升,广东、福建、海南、广西等南方沿海省区得分明显下降,中部地区有所上升,西部地区除四川外基本不变,这种排序是与近年我国 FDI 的流向是基本相符的。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在一期,政策优惠、地理优势、交通状况等因素起主导作用,而在三期,人力资源、开放化、产业化等因素开始起重要作用。

3) 招商引资竞争力分析。盛从锋等^[3]利用 2001 年数据,李雪平等^[4]利用 2005 年的统计资料对各省区的引资竞争力进行评分排序,前三名分别为北京、上海、广东,其他省区大致按其所在的地理梯度排队。

2.2. 分省区的研究

1) 2004 年之前的研究主要是定性分析和主观评价。王如渊等^[5]对四川省 21 个地市州的投资环境进行了评分和排序。总体看四川的区域投资环境整体上并不十分理想,处于全国的中下水平,只有资源禀赋和环境状况处于中上水准。周杰文等^[6]分析了湖北省外商投资企业的结构特点,评价了外商投资企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探讨了湖北外商投资企业投资环境现状,提出了优化湖北省外资企业投资环境的对策。杜群阳等^[7]认为,外商对上海投资硬环境较为满意,对投资

的软环境也比较满意,但与投资硬环境比较,则有一定差距。杨俭英^[8]找到影响甘肃投资的关键敏感因素,即行政办事效率、经济活力和利用外资等指标,从而为改善投资环境找到方向。薛源^[9]计算湖北的投资环境在全国排名 17,在全国处于中游水平。李蔚等^[10]对湖南的分析结论,以长沙为首的沿京广铁路各市条件较好,而湘西地区较差;经济因素是吸引投资的主要因素。陆发安等^[11]发现广西的优势是低廉的劳动力和有特色的自然资源,主要问题是市场的完备性差,政府服务质量有待提高,政策法律环境应保持稳定性。史海英^[12]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经济发展的南北差距是扩大的,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各城市的投资环境差异。

2) 2005~2009 年的研究开始注重社会调查方法的使用。万生新等^[13]将顾客满意度理论引入对投资环境的评估,构建了一套以投资者“满意度指数”(CSI)为核心的投资环境评价体系。哈明虎等^[14]对河北省的投资环境进行综合分析后提出,引资竞争力主要由 GDP 总量、人均 GDP、从业人员人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消费额等因素决定。张长青^[15]认为投资环境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它既是一种竞争力,又是一种凝聚力。建议黑龙江省应在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冬季旅游、国有资本重组、主导产业优选、加大生态保护、完善投资的法律环境和政策环境等方面优化投资环境。乔华等^[16]在对河南省辖市投资环境的分析后认为,经济发展水平是最大的影响因素,基础设施是投资环境的重要因素,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是增强投资吸引力的重要内容,政府管理效率在投资环境中的地位十分突出。张小青等^[17]通过“满意度评价”模型构建与“满意度指数”的调查,断定湖北省软环境改善较明显,软性商务成本首次成为投资环境建设的正向拉力。贾雷等^[18]对云南的研究结论是,投资环境两极分化严重,综合得分为正的只有昆明市一个城市,经济实力雄厚、工业基础较好的城市排名靠前,排名靠后的城市多是以矿业、农业、旅游为主的。陈澜等^[19]对福建 9 个城市投资环境综合得分从高到低的排序依次是:厦门 > 福州 > 泉州 > 漳州 > 三明 > 龙岩 > 南平 > 莆田 > 宁德。刘润芳等^[20]对陕西省投资环境的综合评价是介于“中等”与“良好”之间,并为投资环境

的培育与改善提出了对策。韩延玲等^[21]研究结论是,新疆区域投资环境空间差异性明显,既表现在 15 个地州市之间,也表现在北疆、东疆和南疆三大区域之间,总体上全疆各地区投资环境子系统的发展是不协调的。郭晋杰等^[22]对山西省投资环境研究认为,在综合经济方面,省会城市太原具有显著优势,在生态环境方面,运城、长治两个地区最好,在科技投入方面,太原、大同等一些大城市对科技有较大的投入,在居民生活水平方面,运城、忻州、长治等中小城市最好。赵少平^[23]将安徽的 17 个地级市投资环境分为四等:一类城市投资环境区包括合肥、马鞍山、芜湖、铜陵四城市;二类城市投资环境区包括淮北、蚌埠、淮南三城市;三类城市投资环境区包括宣城、池州、黄山三城市;四类城市投资环境区包括阜阳、巢湖、六安、安庆、宿州、滁州、亳州七城市。

3) 2010 年以来的研究更注重运用规范的统计分析方法。刘炳蔚^[24]对广东的研究发现,广东区域投资环境规模差异明显,粤东、粤西、粤北三大地区投资环境吸引力不足,珠三角内部城市投资环境发展也存在较大差异,广州、深圳占有绝对优势。白倩^[25]对河北的评价,从综合排名的结果来看,石家庄排在首位,唐山的优势也较为明显,廊坊的投资环境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柳青^[26]对贵州的研究发现其具有自身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进步的科技水平,日趋完善的公共管理体制。朱艳^[27]的研究表明,天津城市投资环境在四个直辖市当中处于第三位,整体环境不够理想,与上海、北京两地的投资环境差距很大。李娟等^[28]运用场效应分析山东的投资环境,发现与全国一样,也有一个东中西梯度差距问题。李振江^[29]对内蒙古的投资环境分析结论是,总分处于全国省市的下游水平,外资进入壁垒相对较高,外资投资成本较大,而且在政策环境、社会文化环境、服务环境等方面也存在先天不足。

2.3. 比较性的研究

1) 各地竞争力比较。聂强^[30]综合测度了我国四个直辖市的投资环境竞争力,按得分排序依次为上海(21.94)、北京(19.84)、天津(18.75)、重庆(17.55)。

2) 区位优势比较。罗乐等^[31]选择山东、广东、浙江三省代表东部地区,安徽、河南二省代表中部地区,

重庆、陕西代表西部地区,进行东中西三大经济带的投资环境进行比较研究。其结论是,市场化进程的区域差异是影响投资环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西部地区问题尤其突出。为加快市场化进程,扩大市场规模,西部政府需完善市场体系,推动流通体制、金融体制、用工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加快生产要素市场的建设,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的秩序,打破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为外来投资业主创造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

3) 各地优惠政策比较。高浴熹等^[32]在对上海、苏州、深圳三市的研究中,把投资环境的构成因素分为文化理念、区位交通、城市能力、体制创新、要素价格等五个方面。并对三城市各自的引资优惠政策进行了比较研究,找到了三个城市投资环境及资本流量变化的主要因素。

4) 招商引资实绩比较。和萍^[33]在分析比较西北五省区引资绩效的基础上,提出改善宁夏环境的对策:建立高效廉洁可信的政府;建立健全公开透明的法律法规制度;优先发展教育,注意人才储备;崇尚德行民生,塑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3. 经济区投资环境研究

经济区是指在地理上毗邻、文化上相似、经济上关联的区域。与行政区相比,经济区具有松散性(联系不紧密)、弥漫性(边界不清晰)和异步性(动作不同步)。经济区的形成是自发的,需要长期的磨合才能显示出来,其中各方降低交易费用的需求是推动经济区形成的主要力量。我国经济区的类型主要有:a) 地缘型,因高山、大海或其他地理元素的阻隔而形成的经济区,如三大经济带、东北经济区、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川渝盆地、关中经济区等;b) 流域型,因江河湖泊的交通而形成的经济区,如长江经济带、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c) 都市圈,以一个或数个大城市为核心而形成的经济凝聚和辐射的圈层结构,如上海都市圈、广深都市圈、京津都市圈、武汉都市圈、成渝都市圈等。

1) 对流域经济区的分析。王永跃^[34]对 2004~2006 三年间长三角的 16 个城市的竞争力进行了综合评分,三年平均得分最高的是上海(6.09),最低的是泰州(-2.01)。景高^[35]根据长江流域地区的具体情况,对区位条件、资源条件、交通运输条件、通讯便捷程度、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结构等五个方面进行评估,结论是:长江流域投资环境综合评分为 22.84 分,高于全国均值 19.67,说明长江流域投资环境在全国是属于比较好的。从流域内部看,上、中、下游的投资环境的分值分别为 20.41、23.20、24.33,都高于全国平均值。提出的对策是,充分发挥上海的龙头作用,充分发挥南京、武汉、重庆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加强长江流域大交通体系的建设。范兆斌等^[36]以 AHP 法为基础,比较分析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圈三个经济区的 5 个省市的研发投资环境。分析显示,在 5 个省市中,广东的组合权重远低于北京和上海,以微弱的优势胜于江苏。高等教育相对较弱,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比重较大,市场需求的规模和方向等是广东 R&D 投资环境的软肋。

2) 对三大经济带的分析。宋丹等^[37]分析了我国东部 11 个省区投资环境的优势和劣势。运用各地区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和各地区外商企业年底注册登记情况进行评价,反推当地投资环境的优劣。从评价的结果看,排名依次是广东、江苏、上海、山东、浙江、辽宁、北京、福建、天津、河北和海南。从业绩看,广东的投资环境是全国最好的,紧随其后的江苏和上海还有很大的差距。徐文洁等^[38]设计了西部 11 省区(西藏除外)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从自然资源、经济环境、基础设施、社会环境等四各方面,根据 2001 年的统计数据,得出各省区的投资环境综合评价价值。并据此将 11 个省区划分为投资环境优良区(新疆、陕西、四川)、中等区(重庆、广西、云南、内蒙)和较差区(贵州、甘肃、青海)三种类型,并主张西部地区应以资源、能源开发和旅游为主吸引外资。张宛平^[39]对中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进行了比较分析。该文较早认识到“招商选资”问题,认为在东部和中部的一些省市对直接投资项目的的需求已经从数量转变为质量,而能否成功地争取得到高质量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进入并能从中受益,则取决于投资环境与投资项目的适应程度。田孟清^[40]对西部民族地区投资环境进行了分析,认为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背景下,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应扬长避短,主要精力应放在优化投资环境上。

3) 对都市圈的分析。石吉金等^[41]分析了乌鲁木齐都市圈 7 市 2 县的投资环境,得到的结论是:乌鲁木

齐都市圈在区位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生产要素、投资政策等方面具有突出优势,其中像区位条件、生产要素和投资政策等方面的优势,是其他许多发达地区不能相比拟的。陈宝玉^[42]对武汉城市圈的 9 个城市进行了比较,认为武汉市及周边 8 个城市经济建设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这些城市的投资环境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各城市之间的经济差异更是十分显著的,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

4. 开发区投资环境研究

开发区是指实行特殊优惠政策的行政与经济相统一的科技工业园区,它由国务院和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在城市规划区内设立,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国家旅游度假区、边境经济合作区等形式。截止 2011 年底,全国共有经济技术开发区 132 个,高新技术开发区 88 个,边境经济合作区 12 个。对各级各类开发区投资环境的研究也是一项重要的研究内容。

1) 对全国开发区的研究。俞勇军等^[43]对当时的 45 家国家级开发区运用硬环境指标 6×52 个、软环境指标 4×15 个进行了系统分析,得到的结论是:在综合经济指标、基础设施配套能力、经营成本指标、人力资源及供给指标、社会及环境指标、技术创新环境指标等六大评价要素当中,经营成本指标是影响力最小的指标。全国经济开发区已经分化出三个层次:天津、大连、广州、昆山等经济开发区为第一类,特点是综合经济实力绝对领先,各指数排名比较平衡,没有短腿现象;宁波、青岛、北京、沈阳、杭州等经济开发区为第二类,这类经济开发区的特点是综合经济实力较强,但存在部分指数排名滞后,存在短腿现象;其它可称之为第三类经济开发区,这类经济开发区的特点是综合经济实力较弱,各类指数的排名也较为平衡,但总体上各指数水平都较差。

2) 对部分开发区的研究。丁峰^[44]对天津、上海、广州等地的 13 个国家级开发区的政策环境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研究,对于它们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如天津开发区提出的“环境是泰达的生命,我是泰达的环境”,广州开发区提出的“一切为了投资者,一切为了企业”,苏州工业园区提出的“亲商是最重要的投资环境”理念,上海漕河泾开发区提出的“客户至上,

追求卓越”，大连开发区提出的“三心三同”即对企业发展上心，项目承诺诚心，解决困难尽心，审批程序零障碍，上门服务零距离，优质服务零投诉等，无疑都为优化开发区的投资环境创造了条件。

3) 对省域开发区的研究。邓宏兵等^[45]对湖北省省级以上开发区的投资环境进行了综合评价。他们设计了一个 $2 \times 7 \times 22$ 的指标体系，运用 AHP 法、主成分法、灰色相关法综合评分，评价了 22 个省级以上开发区。其结论是：湖北省各开发区投资环境总体水平不高，依据就是在汇总得分中，得分为正值的开发区只有 6 个，而为负值的则多达 16 个，占到总数的 73%；开发区投资环境相差悬殊，发展成就不平衡；开发区投资环境的区位特征明显，武汉占有绝对优势。

5. 结语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整体分析归纳，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政治资源是决定区域投资环境的首要因素。全国各地决定一个地区投资环境因素的排序是大体相似的，依次为：政治资源、经济规模、交通状况、资源禀赋。政治资源包括政策指向是决定一个地区投资环境的最重要因素。就全国来看，北京的政治资源禀赋最高，就各省来说，省会城市总是鹤立鸡群，沿海开放城市由于政策的指向，前期投资环境也远超其他地区。

第二，各地投资软环境的优化普遍弱于硬环境的建设。为了招商引资，各地竞相出台优惠政策，从开发区的“五通一平”到“九通一平”，从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到土地、自然资源供给优惠，各地可以说是奇招叠出。但是，在法律的规范性、政策的稳定性、服务的质量和人文环境的和谐等方面却注意不够。所以，多数研究报告主张改善区域投资环境要从软环境优化入手。

第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国民待遇标准的推广，区域投资环境的差别正在缩小。在改革开放的前期，沿海开放区与其他地区的投资政策差别巨大，导致国内外资本纷纷流向沿海省市。但是随着这些地区超国民待遇的取消、要素成本的上升，沿海和内地的差别正在缩小，越来越多的资本已经并正在流向中西部地区。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张雅清. 中国各省市投资环境的统计分析[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6, 23(1): 67-70.
- [2] 张钟学, 卞爱莲. 中国各省投资环境的空间动态的面板数据分析[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2: 75-83.
- [3] 盛从锋, 徐伟宣, 许保光. 中国省域投资环境竞争力评价研究[J]. 中国管理科学, 2003, 11(3): 76-82.
- [4] 李雪平, 邓宏兵, 庄军. 中国省域投资环境竞争力比较研究[J]. 商场现代化, 2006, 11: 170-171.
- [5] 王如渊, 金波. 四川省投资环境的区域差异[J]. 地理学与国土研究, 2000, 16(2): 29-32.
- [6] 周杰文, 邓宏, 段一群. 湖北省外商投资企业投资环境研究[J]. 理论月刊, 2002, 10: 62-64.
- [7] 杜群阳, 程惠芳. 关于上海外商直接投资环境的调查与对策研究[J]. 上海经济研究, 2003, 7: 31-36.
- [8] 杨俭英. 甘肃省投资环境评价[J]. 兰州商学院学报, 2003, 19(3): 80-84.
- [9] 薛源. 省外商投资企业投资环境研究[J]. 认识地理过程, 关注人类家园——中国地理学会 2003 年学术年会文集, 2003.
- [10] 李蔚, 袁开国, 杨洪. 湖南省区域投资环境评价[J]. 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 2004, 4: 23-24.
- [11] 陆发安, 朱寿育. 广西投资环境现状分析及对策思考[J]. 市场与计划探索, 2004, 3: 14-17.
- [12] 史海英. 江苏省各城市投资环境综合评价研究[J]. 江苏工业学院学报, 2004, 5(1): 32-35.
- [13] 万生新, 万生更. 陕西省投资环境满意度指数实证分析[J]. 经济与社会发展, 2006, 4(7): 63-65.
- [14] 哈明虎, 张会敏, 白云超. 河北省投资环境综合评价研究[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31(5): 39-43.
- [15] 张长青. 黑龙江省投资环境问题研究[J].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06, 4: 48-50.
- [16] 乔华, 刘文太, 乔新民. 河南省辖城市投资环境评价报告[J]. 决策探索, 2006, 5: 37-38.
- [17] 张小青, 邓锋, 毛冬焰. 湖北省投资环境满意度评价实证分析[J]. 商业时代, 2006, 6: 91-92.
- [18] 贾雷, 卢正惠. 云南省地级城市投资环境评价研究[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09, (6).
- [19] 陈澜, 伍世代. 福建城市投资环境比较研究[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5: 12-17.
- [20] 刘润芳, 鲁玲. 陕西省投资环境的模糊综合评价[J]. 商业研究, 2007, 6: 211-213.
- [21] 韩延玲, 高志刚. 新疆区域投资环境的组合评价研究[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07, 1: 21-22.
- [22] 郭晋杰, 郎倩, 邱昕. 山西省各城市投资环境综合评估研究[J]. 太原科技, 2007, (2).
- [23] 赵少平. 安徽省城市投资环境的实证研究[J]. 商业时代, 2008, 13: 95-97.
- [24] 刘炳蔚. 广东省区域间投资环境比较与评价[J]. 商业时代, 2010, 7: 134-135.
- [25] 白倩. 河北省地区投资环境评价[J]. 全国商情(理论研究), 2010, 21: 13-14.
- [26] 柳青. 对贵州省投资环境的综合评价[J]. 经营管理者, 2011, (23).
- [27] 朱艳. 天津市投资环境评价与对策研究[J]. 城市探索, 2011, (7).
- [28] 李娟, 沙景华. 基于场效应的山东省外商投资环境评价[J]. 山东经济, 2011, 3: 147-152.
- [29] 李振江. 基于等级评分法的内蒙古外商投资环境分析[J]. 经营管理者, 2011, (5).
- [30] 聂强. 中国四个直辖市投资环境竞争力比较研究[J]. 开发研究, 2010, 6: 88-90.
- [31] 罗乐, 张应良. 区域投资环境竞争力评价——基于七省(市)

- 的实证分析[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25(5): 49-56.
- [32] 高浴熹, 旅建华. 沪深苏三市投资环境比较[J]. 上海经济研究, 2003, 2: 3-10.
- [33] 和萍. 关于宁夏投资环境改善绩效的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J]. 市场经济研究, 2003, 4: 14-16.
- [34] 王永跃. 长三角地区主要城市外商投资环境综合评价和动态分析[J]. 特区经济, 2008, 9: 58-59.
- [35] 景高了. 长江流域投资环境分析与评价[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4, 38(4): 519-532.
- [36] 范兆斌, 陈春燕. 我国三大经济带企业 R&D 投资环境的比较[J]. 统计与决策, 2008, 12: 74-76.
- [37] 宋丹, 刘龙东. 东部投资环境综合评价[J].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0, 9: 59-60.
- [38] 徐文洁, 杨德刚, 张小雷. 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的区域差异[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04, 18(2): 102-105.
- [39] 张宛平. 中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比较[J]. 上海理工大学学报, 2001, 23(4): 363-367.
- [40] 田孟清. 西部民族地区投资环境分析[J]. 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 2000, 11(2): 1-5.
- [41] 石吉金, 杨兆萍. 乌鲁木齐都市圈投资环境分析[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07, 18(12): 32-37.
- [42] 陈宝玉. 武汉城市圈投资环境的评价[J]. 统计与决策, 2009, 21(2): 72-73.
- [43] 俞勇军, 陆玉麒. 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环境评价及改善策略研究[J]. 经济地理, 2004, 24(3): 395-398.
- [44] 丁峰. 国家级开发区投资环境发展趋势研究[J]. 改革与开放, 2006, 13(12): 17-18.
- [45] 邓宏兵, 文余源, 沈福喜, 段娟. 湖北省省级以上开发区投资环境综合评价[J]. 云南地理环境研究, 2003, 15(3): 83-88.